

書評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314 頁。

鍾尚文

英國愛昔斯 (Essex) 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在《媒介與現代性》一書中，湯臣 (J. B. Thompson) 延續和整合他以前在社會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分析，並嘗試建構一套社會理論架構去了解傳播媒介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係，以及傳播媒介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實質影響。湯臣指出，社會學家忽略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當他們處理現代社會發展這個問題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價值觀念的改變上，強調傳統社會對神話的執迷和現代社會對理性的嚮往。湯臣試圖跳出此一制限。他嘗試整合不同的社會和傳播媒介理論，希望可以從宏觀和微觀的層面檢視媒介作為一個科技和制度的結構性改變過程，以及探討媒介結構性的改變如何轉化人們互動形態及對自我的理解。再者，湯臣更嘗試從一個實踐的角度出發，考察媒介對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及其在現代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令現代社會公共性能在不受干預的基礎下，體現其多元性和批判性。

湯臣指出，由十五世紀至現在，西方社會的傳播媒介經歷了不少轉變。由早期複印技術的出現，以至由十九世紀發展到現在的電子傳播媒介網絡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展現出現代社會發展的商業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令資訊以史無前例的高速向世界傳播開去，逐步重整了現代社會的時空性，使得人類的生活經驗不再受時空的制限。一個非共存性、非



對話性和非地域性的公共性漸漸轉化，也同時代替了傳統公共性所講求的共存性、對話性和地域性。這個通過傳播媒介聯繫起來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ness)，令訊息可以同時傳送予無數接收者，人類不需親歷其境，亦能經驗時空上老遠的事物。傳播媒介不但可以聯繫我們對歷史和世界事物的理解，更可以建構社群的認同和歸屬感。湯臣強調，在接收訊息的過程中，受眾往往切身處地以自身的文化和歷史出發，對訊息作出理解和對自身處境進行反思。¹ 他們亦扮演了監察權力的角色。傳播媒介把原本不可被看見和聽見的資訊廣泛流傳開去，一個政治領袖的權力亦往往因為這樣而備受責難和挑戰，傳播媒介便在這意義下重整了權力關係。²

不少媒介理論學者認為傳播媒介是意識形態的控制工具。對他們而言，這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缺憾。這些對現代社會的批判預設了傳播過程的單向性和受眾的被動性。湯臣嘗試修正這些看法。他透過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分析，體現了受眾在現代社會的主動性、批判理性和反省性。對於湯臣而言，現代社會的傳播媒介是一個互動和充滿詮釋意味的過程。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媒介研究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學術範疇。湯臣可以說是罕有地從一個整合的角度，有系統及全面地去理解傳播這個過程及其對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實質影響，為媒介理論學者在宏觀和微觀這個糾纏不休的問題上，提供一個整合的理論發展路向，探討傳播媒介在社會文化脈絡的發展如何影響當中群體的社會政治生活，使我們重新反思現代社會的本質。但湯臣並沒有停留在純理論的討論層次，他透過有系統檢視傳播媒介對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嘗試重整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性和現代社會的看法，從一實踐的角度指出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使得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能體現其多元性。



哈氏在其《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變》³一書中指出，由於西方傳播媒介急促的發展，資訊的流動變得單向性，備受操控和充滿營造意味，公民再不可用合理理據為基礎對社會事務進行理性的討論，因而也不能扮演對政治權力監察的角色。湯臣指出，哈氏對公共性的理解過於狹義，只着重這個概念的對話性和地域性，忽略了傳播媒介全球化和商業化的趨勢已把公共性轉化成非對話性和非地域性。這個改變促使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現代社會公共性的自由性和獨立性如何得以重建和確立，使我們可以窺探現代社會未來的發展路向。

湯臣認為，在傳播媒介商業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下，國家權力的介入並不是唯一干預言論自由的因素。一小撮跨國的傳播媒介集團往往能壟斷資訊，使其失去了多元性。湯臣提出一套規律多元主義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gulated pluralism)，透過法律的約束和鼓勵，令不同和獨立的傳播媒介團體可以蓬勃地發展，使資訊可以以多元和不受政治干預的基礎向世界傳播開去。可惜的是，湯臣沒有詳細交代這一套原則的實質內容。另一方面，湯臣強調，一些社會上邊緣的聲音，如女性主義運動、民權運動和其他政治運動，正是因為傳播媒介能把這些問題廣泛流傳，並引起其他人的支持。傳播媒介正為現代社會發展出一個可見性空間(the space of the visible)，使不可見性(invisibility)可以轉化成可見性(visibility)。人們可以透過爭取可見性(struggles for visibility)，把現代社會政治生活政治化，使其具批判性。這個多元性和政治性的空間為我們建立一套對全球人類負責任的集體倫理意職(the ethics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令社會政治生活不再以某人或某社群的利益為依歸，而是擴大到人們對世界人類和非人類的負責、認同和關注。這個沒有時空界限的多元性和政治性空間亦令我們重新評估民主政治的模式。湯臣指出，民主政治不應再局限在某聚集點內的一小撮人身上，而應更有效地和廣泛地通過傳播媒介



對資訊的放送和接收，使自主的個體可以運用合理理據來衡量不同的意見，使決定具有認受性。這個論辯式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過程，使權力的運用備受挑戰和監察。

湯臣提出的規律多元主義的原則，強調法律制度對傳播媒介團體的監管及國家權力對它們的不干預性。可是，正如上文所指，湯臣完全沒有交代在這個監管的過程中，我們以甚麼具體理據為基礎去篩選那些多元的聲音。這個理據又如何可以達致，使其決定具有認受性。在缺乏此種理據的情況下，多元性空間的批判性基礎又如何得以確立？又如何可以確保這個監管過程不會變成另一種政治干預的手段，而扼殺了一些有存在價值的邊緣聲音呢？湯臣對這個概念的討論無疑是過於粗略，使以其為基礎的論辯式民主，失去了具體實踐的理據。

另一方面，湯臣亦未能夠對訊息和受眾之間的關係作更深入的處理。湯臣指出，傳播媒介可以為現代社會建立一個可見性的政治空間，令受眾可以扮演對政治權力批判和監察的角色。明顯地，湯臣在這個問題上預設了受眾所見的便是現實的全部。問題是，這個空間背後正隱藏着一個意識形態的空間，指導訊息應如何被建構出來。這些扭曲了的訊息，直接建構我們對其他社群認同與否，更影響我們對世界事務的理解。在這個全球化的趨勢下，訊息傳遞的速度和所覆蓋的範圍，往往使它成為有效的思想控制工具。從這一個角度去理解傳播這個過程，受眾所監察的只是一個被建構和營造出來的表象。筆者想指出的是，除了監察這個表象的訊息世界外，我們應該進一步探討和批判這個表象背後的意識形態世界。更重要的是，受眾在這過程中可以和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呢？湯臣沒有對媒介訊息的本質作很深入的討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表面的訊息世界，沒有觸及這個表象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影響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同時，湯臣亦指出，傳播媒介為現代社會建立出一套對全球人類負責任的集體倫理意識。



傳播媒介的全球性無疑為社會群體的認同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族群間的認同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筆者所懷疑的是，傳播媒介怎樣建構是一件事，而受眾如何回應着這事件又是另一件事，這是兩個不同而又沒有必然因果關係的變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湯臣自己也承認，傳播媒介發展出來的一個不定性的空間，並沒有保證受眾對訊息會作出甚麼回應。而某族群對另一族群的認同更牽涉他們之間的歷史、社會文化以至經濟的淵源。明顯地，湯臣對訊息和受眾這個關係的探討過於片面，使他對有關實踐的問題的討論，失去了具體的理據。

湯臣在其理論架構中，挪用了不少主流的傳播媒介和社會理論，卻沒有論及後結構主義者對討論傳播媒介和現代社會發展這個關係的貢獻。眾所周之，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討論權力的問題時，便強調權力關係的多元性和獨特性，傳播媒介像一座監控站(Panopticon)，規律化我們生活的每一部分，令被監控者自覺地遵行紀律，傳播媒介因而成爲很有效的監控(surveillance)工具。另一後結構主義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則指出，資訊的膨脹已令我們步入一個以影像和符號爲主，疑幻疑真，難分真假的虛擬世界中。互聯網絡的發展又正意味着科技理性的膨脹，使受眾變成這個訊息網絡世界的接收站和發送站。湯臣的討論只注重傳播媒介對現代社會的正面影響，欠缺了後結構主義者對傳播媒介甚具批判性的剖析。筆者相信，要發展一套理解傳播媒介的社會理論，我們不但要了解傳播媒介在何等意義和具體理據下可以轉化和重建現代社會的社會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從一個批判的角度，探討有哪些因素窒礙了這個轉化過程。唯有這樣，我們才會更適切地看到現代社會發展的過程和矛盾，使我們可以更具體地和現實地從一個實踐的角度窺探現代社會的出路。



注釋

- 1 接收研究 (reception study) 處理受眾如何閱讀和挪用媒介訊息，這方面的代表作有 Ien Ang,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5); Davi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and New York: Comedia, 1986) 及 Janice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7)。受眾這個概念的演變及其所引申的研究議題，可參看 David Morley, "Theories of Consumption in Media Studies," in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ed. Danial Mill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296-328。以詮釋學的角度研究接收這個過程，可參看 Tony Wilson, *Watching Television: Hermeneutics, Recep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2 值得一提，湯臣在這個層面的討論完全運用了一個媒介理論學者 (medium theorist) 米路域斯 (Joshua Meyrowitz) 的整合和研究成果。米氏指出，第一代的媒介理論學者如麥高漢 (Marshall McLuhan) 太強調傳播媒介的發展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環境。對於米氏而言，這個層面的分析是過於制度性和結構性，沒有論及人類生活互動的形態如何隨之而改變。米氏整合了哥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分析於媒介理論中，從而可以處理傳播媒介的宏觀和微觀影響。米氏不但處理政治權力的關係，其分析又觸及社教化過程和群體身分如何受到傳播媒介的影響。相對於湯臣而言，米氏的分析更全面和透徹。有興趣參閱更具原創性的討論，可參看 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